

四、医德高尚,力改时弊

近代中医在受到西医排挤的情况下,失去了对前途的信心。许多中医生视医术为谋生的手段,唯利是图,失却了作为医生灵魂的医疗道德。而曹颖甫正相反,他具有崇高的医德。蒋维乔说:“中年肆力于医乡人亦莫知之,及其应世,凡他医所谓不治之症,颖甫辄着手愈之。且于富者有时不肯医,于贫者不取酬,且资其药。”

一些医生如同江湖术士，鼓吹“道无术不行”，追求怪异，哗众取宠。如鲁迅先生曾尖锐讽刺过的庸医用配对的蟋蟀，经霜的芦根，破鼓的皮治疗鼓胀的所谓医术。有的医生迎合民间喜补畏攻，喜轻避重，只议药不议病的社会心理。这就使庸俗的医风医术流行。

曹颖甫反对这种现象,说:“道无术不行。昔固闻而疑之。窃谓江湖术士,有时自秘其长,以要人重币,医虽小道,为病家生命所托,缓急死生,间不容发,何处可用术者?”医生以救治病人为职责,应当如同孙思邈《大医精诚》所言:“一心赴救,无作功夫形迹之心,如此可为苍生大医”,全心全意救助病人,排除一切私心杂念。

温病学说在大江南北盛行后,使一些庸医没有真正学习好叶天士、费伯雄等医家的“平淡神奇”的思想,成为所谓“轻灵派”——如章次公所讲的“当今之世,薛叶学说盛行,胆小如鼠。(自诩能得仲景遗意,于苏医曾加掊击之某新中医家犹如此。)用药又拘泥时令,于夏日炎蒸之际,几无人敢用生附子疗治霍乱,必待周身之水分排泄殆尽,然后求于西医之盐水针,且称西医之所长,即在救急,以文其过,仲景之学,日就凌替,可胜慨哉!”

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说：“古之时庸医杀人，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，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，其病日深，而卒至于死。”

曹颖甫坚持运用经方,“予率性婞直,宁终抱卞和之璞,雍门